

被冷落， 但不能忘的王默人

王默人因為自己的生存經驗非常坎坷，
因此他念茲在茲的，即是自己的經驗，
以及與他經驗類似的弱者，又以外省邊緣人為主。

◆南方朔 作家、評論者

邊緣性的外省作家

作家有幸與不幸兩種。

幸運的作家，是指他們寫作的表現方式，能夠與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群落的氣氛相合。因此他的作品會有較多讀者，知識分子因為有迴響，肯定性的討論也比較多，於是他遂可以揚名立萬，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。

而不幸的作家並不是他寫得不好。而是他關切的課題和寫作的方式，脫離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主流，因而缺少了迴響，他的寫作也就注定了寂寞。而寂寞的作者當然成了不幸的作者。

近代台灣，文學上隔著政治社會的變化，出現了幾個波動的生態：

1949年到1960年代，由於中國變天、港台等地離散出許多文化知識人。當時的美國新聞總署為了安頓這些「南來作家」的生活，在香港辦了「亞洲文學出版社」等機構，出版非共和反共的文學作品。這種「南來作家」從此以後成了香港文學的主流，只有到了近年，香港主體意識興起，對「南來作家」才開始反省。而這種「南來作家」的傳統到了台灣，則是民國

40到60年代，以南來台灣的外省作家為主的「反共文學」和「戰鬥文學」，除了部分文人之外，它其實以軍中作家佔了最大比重，強調健康性的寫實，我在中學文藝少年時所讀的《文壇》、《亞洲文學》、《幼獅文藝》即屬於這個系統。但從民國60年代後，由於台灣漸次發展，西化程度增加，於是以校園青年為主的文學遂向戰後西方文學傾斜。

在文學氣氛這樣的轉折中，有兩種作家都淪為不幸的作家。第一種是台灣本土文學的作家。本土作家在「反共文學」和「戰鬥文學」當道的時代，由於政治掛帥，當然擠不進文學的光譜，本土作家當然受到外省作家為主的文壇所歧視。而後來的現代文學，仍是以校園中的外省人為主，與現代文學相比，本土文學當然也被認為較為劣等。所幸的是，民國60年代後，台灣的本土覺醒出現，於是以前受到歧視因而被邊緣化的本土作家開始敗部復活，不被重視轉為重視。

台灣的本土作家有不幸轉為幸運的過程，但有另外一種作家卻沒有這樣的轉折。那就是邊緣性的外省作家。這種外省作家，他們關切的主題是社會中的弱者，而他們的表現方式則是

樸素的寫實主義，加上它敘述的主要是台灣的外省人。所以在台灣的反共文學、現代主義文學，以及本土文學三種時代的氣氛下，它一種也沾不上，只有它的外省文學成分和戰鬥文學那個時代有一點淡淡的關係。然後就和台灣文學的生態變化愈離愈遠。最後甚至被人們所淡忘。這種外省作家是台灣最不幸的作家。早年我的作家朋友王默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。

民國38年，國民政府被趕出中國大陸，流亡到台灣。在那個動亂的年代，有許多外省軍公教及學生也跟著政府到了台灣。那段歷史的細節，後來已很少被人提到。例如我在早年的《文壇》就讀過這樣的故事。有流亡的女大學生為了生存，隨便找個人就嫁了，等到後來局勢穩定，生活漸趨正常，這種由於離亂而形成的夫婦沒有不出問題的。另外我後來認識了個當年流亡來台的中學生，他告訴我，他們流亡後生活無著，都是靠政府救濟，後來被安置在員林實驗中學就讀，才完成學業，重新開始他們的人生。那個時代，諸如此類的故事極多，但都沒有留下紀錄。

在我的印象裡，王默人即是民國38年，單獨一人到台的小中學生，他出生於民國24年，因

土地之夢的幻滅

南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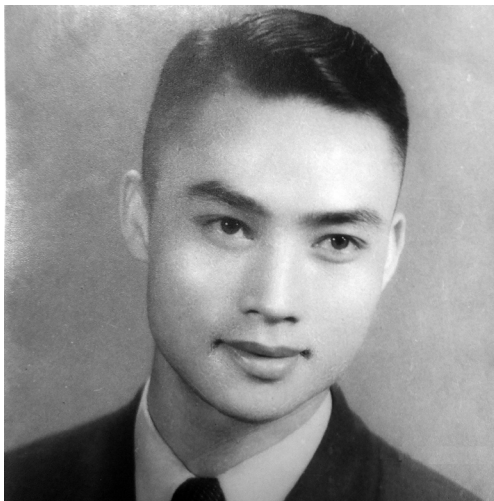
一 「土地之夢」的始源

在農業社會，農民因為生活的鎖鏈而釘著於土地之上。土地是滋生萬物的母胎，它吸納了農民的血汗而蔚成豐稔的穀糧和果蔬，在那樣的社會結構下，土地和伴隨著土地的人與事，成了農民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寄託和農民效忠的對象。 Robert Redfield 與 Milton B. Singer 將農民這種認知的對象稱為「神聖的中心」(Sacred Centers)，環繞著這個神聖的中心，農民對於他生長於斯的土地產生出歸屬感，覺得心理上的安定，並願對這塊土地獻身。

但是，亘古以來，農民與土地的關係並非如此和諧美滿，無數的災難總是自然的或人為的加諸農民與土地，租稅的層層盤剝，不可抗拒的天災疫癘，兵連禍結的長年爭戰，異族的橫蠻入侵，以及資本主義基調的現代化過程等，一再，再而三的摧毀了這座「神聖的中心」，將農民趕出土地。因此，「土地之夢」便成為多數地區農民面對這些挑戰的內歛反應，被驅趕出土地的農民在困頓、無能、土地之夢的幻滅

四八一

南方朔以早年筆名南亭，發表〈土地之夢的幻滅〉評論王默人小說，原發表於1978年《大高雄》雜誌，後收錄於1980年《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·文學論評集》。



王默人1960年前後攝於台灣照相館，時年約25歲，可說是出道極早的作家，他開始寫作的那個年代也決定了他寫實主義的寫作風格。（周安儀提供）

此來台時只有14、15歲。在那個混亂的年代，一個小中學生想要存活下來，其艱苦可知。因此我認為王默人最重要的著作，應該是去寫他的自傳，相信他的生活經驗一定會留下重要的紀錄，添補上那個時代最大的空白。

而他的自傳至今還沒有出現，但許多片段卻隱藏在他的文學作品中。我們知道，這個小中學生到了台灣後，艱苦維生，他常過著一天只有一個饅頭的日子。他後來到師範大學讀過書，也在民防電台當過記者。我在1970年代末認識王默人時，他是《經濟日報》記者，也是個出了許多本短篇長篇作品的作家。

王默人的寫作風格

王默人的第一本著作是民國47年所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《孤雛淚》。根據他的自述，他開始寫作始於民國41年，那時他才17歲，可能是參加了「中華文藝函授學校」，因而進入了文藝圈。因此王默人可說是出道極早的作家，而他開始寫作的那個年代也決定了他的寫作風格：

（一）他的作品都是老式的寫實主義。而台灣的寫實主義與中國1930至40年代的社會寫實主義並不相同，台灣的寫實主義受到政治反共

的影響，都不注重群體性，而只是著重個人的生活經驗，因此台灣的寫實主義比較缺乏批判性，批判寫實主義在台灣也不被容許。

（二）王默人因為自己的生存經驗非常坎坷，因此他念茲在茲的，即是自己的經驗，以及與他經驗類似的弱者，又以外省邊緣人為主。這些邊緣人在台灣的底層掙扎求生，雖然有時候會發出人性的光輝，但多數都是悲慘的片段。因此，對於許多把閱讀當成一種樂趣的讀者，他的著作就成了沉鬱不快的負擔。

（三）王默人的作品，對民國40、50年代，台灣仍然貧窮時的生活方式有很詳細的敘述。例如那個時代，普通人家都沒有瓦斯，也沒有電爐可用，都只是燒煤球，那是一種把細煤渣混合一點黏土，把它打成中間有很多孔洞的煤球的燃料方式，他自己就大概當過煤球工人。例如當時台灣的窮苦婦人，也經常去挨家挨戶的幫人洗衣服謀生。對於這種貧苦人的生活方式，他的作品都有詳盡的敘述。但這種生活方式是人們想要揚棄的不愉快生活經驗，因此他的這些敘述，當然不受到人們喜愛。

（四）台灣從民國40年代到60年代，主要是外省作家的反共文學為主流，民國60年代後，

青年輩的鄉土文學和西化文學抬頭，描寫窮苦人生活的批判寫實主義也開始出現，王默人一方面可能是性格內向，並沒有和那一派接近，也可能他在新聞界，對政治比較敏感而畏懼，知道批判寫實是政治上的一種風險。因此他的寫作主題和表現方式，遂愈來愈邊緣化，雖然他極內斂，但那種以窮人為題材的表現方式，仍然被文藝官僚異眼相看。因此我敢斷言，他在民國60年代時，應該是有受到某種程度的軟性迫害。台灣的迫害文化非常奇特。活動力較強，比較有幫派歸屬的作家，抗壓性較大；而比較單獨的外省作家則抗壓性極低，深怕一旦被整，就會失業、衣食無著。

王默人小說裡所寫的窮人生活經驗，在民國60年代可能許多人都忘記，但他寫的挨家挨戶洗衣服，以及刻鋼板賺點生活費，這卻是我們家裡早年的經驗。因此當時我讀到他的作品時是很有感覺的。民國67年八月號的《大高雄》雜誌上，我還以早年的筆名南亭，發表了一篇長篇論文〈土地之夢的幻滅〉，那是我讀他的作品之感。當時我們因為都在新聞界工作，因而締交，他甚至去過我家拜訪。現在多年未曾聞問，在我記憶裡，王默人是個相當受到壓抑

的人，他拘謹多禮、服裝乾淨，但表情多憂傷，對自己的作品未受到足夠的評價覺得挫辱。由於流亡的經驗已成了他人生的調性，儘管他後來在《經濟日報》等中高薪單位工作，生活已大幅改善，但他寫作的調性已定，不可能改變。可能由於在台灣很有壓抑感，後來他遂赴美，文學已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！

王默人雖然在文學上懷才不遇。但我認為王默人這個人卻有一定的傳奇性。他是個小小中學生，孤身一人流亡到了台灣，掙扎求生，歷盡折磨考驗，原本想在文學上安身立命，但他的生命經驗卻和台灣的發展無法連結，遂使得他的文學夢無法成真。這不是他的文學不好，而是時代使然。近代台灣有許多人都被遺忘，王默人所代表的那個流亡學生族群，人數可能不是很多，但他們在時代變化中所歷經的苦難，絕對是不應遺忘的重要片段。聽說王默人雖已年邁，身體狀況似乎尚好，因此我更盼望他能自己書寫或以口述，留下較詳細的傳記，那可能是台灣近代重要的篇章！

